

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与管理研究

翟志强 著

中国美术学院标志性成果规划

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与管理研究

翟志强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章腊梅
责任校对 钱锦生
版式设计 徐小祥
责任出版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与管理研究 / 翟志强著. —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3. 12
(中国美术学院标志性成果规划)
ISBN 978-7-5503-0623-3

I. ①明… II. ①翟… III. ①宫殿—古建筑—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TU-09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572号

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与管理研究

翟志强 著

出品人 曹增节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http://www.caapress.com>

地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 31000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3

字数 240千

印数 0001-1000

ISBN 978-7-5503-0623-3

定价 60.00元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节 选题依据和意义 /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3

第三节 本书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9

第一章 明代皇家建筑的分类和营建缘由 / 17

第一节 皇家建筑的分类 / 17

第二节 皇家建筑的营建缘由 / 19

第二章 明代皇家营建的选址 / 32

第一节 明代都城和宫殿的选址 / 32

第二节 明代帝陵选址 / 63

第三节 明代地方宗室营建的选址 / 77

第四节 明代其他性质皇家营建的选址 / 88

第三章 明代皇家营建规制的拟定 / 101

第一节 拟定規制时的考虑要素 / 101

第二节 明代三都宫殿营建规制的拟定及其承袭关系 / 108

第三节 明代帝陵营建规制的拟定 / 115

第四节 明代宗室营建规制的拟定 / 119

第四章 明代皇家营建经费的来源与管理 / 133

第一节 明代财政概况 / 133

第二节 营建费用的来源 / 144

第三节 营建经费管理 / 169

第四节 皇家营建消耗的经费概况 / 185

第五章 明代皇家营建物料的筹集与管理 / 209

第一节 木料的采运和管理 / 209

第二节 砖瓦的造运和管理 / 221

第三节 石料的采运和管理 / 228

第四节 土、灰、颜料等物料的筹集管理 / 232

第六章 明代皇家营建中的人员管理 / 244

第一节 负责皇家营建管理的各部门官员 / 244

第二节 皇家营建的劳动力管理 / 258

第七章 明代皇家营建的施工过程管理 / 300

第一节 兴工管理 / 300

第二节 确定施工顺序 / 305

第三节 施工进度调控管理 / 313

第四节 完工升赏和罚治 / 321

结语 / 337

参考文献 / 350

后记 / 360

绪论

第一节 选题依据和意义

一部中国建筑史就是一幅我们祖先从野蛮蒙昧的穴居野处演变至今天高楼大厦的历史时代的鲜活的文明演进图。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我们祖先组织管理水平发达程度的明证，是特定历史时期我们祖先审美价值的外在固化。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建筑技巧和工艺的特色，更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主观表达，因而中国古代建筑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

在“地球村”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广泛、深入而又频繁的国际交流使得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渐消失，趋同性日益呈现。现代国人有时不免陷入迷茫：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们何以把自身与其他民族区分，我们得以存在的依据在哪里？在现代同一性的文化大潮中，中华文明的地位何在？回顾历史，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祖先留下的故宫、长城、帝陵、园林时，答案似乎非常清晰而肯定。中国古代建筑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们充分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精湛的建

筑工艺、高超的科技水平，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誉。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是保护、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探求民族文化自立的有益之举。

在新时期的中国，大型土木工程成为国家建设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会面临许多困境和难题。古代辉煌的建筑在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同时，也会给我们提供无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给我们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益启发。¹

总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就明朝而言，明朝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朝代，从王朝鼎建伊始至其灭亡，都城、皇陵、苑囿、桥梁、寺庙道观、藩府等等，一些列的营建活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其中皇家营建尤其值得关注。

所谓皇家营建主要有三层含义：为皇室服务的工程营建；皇帝主导的皇家工程营建；皇帝敕建的工程营建。这类工程往往举全国之人力、物力来完成，其最大独特之处在于它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它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和特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在这类营建工程中，皇帝、勋戚、宦官、内阁学士、六部官员、科道风宪、地方官吏、平民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经济事件中。这类工程是如何进行的？在营建过程中，政府行政机构是如何管理的？参与营建活动的各级行政机构和人员在工程中的作用如何？这些问题的梳理与解答一定会加深对明代工程建设本身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属于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它不仅是技术，更是思想；不仅是物，更是人。它是把物和人结合的媒介，管理体现了技术发展的水平，同时体现了社会思想，它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工程营建管理能很好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

通过对皇家营建的运作和管理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开辟一条研究明代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的新思路。以往对制度史的研究往往是从制度入手

到分析制度结束，即就制度本身谈制度。这种方法未免流于僵化，不利于真正认清明代政治制度。而以皇家营建为特定视角，以特定的事件为中心，分析明代政府组织在其中的行为、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可以充分凸现各组织机构的职能、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可以反映出明代政治状况及其演变。

明代财政和经济研究始终是个难题，而皇家营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营建财物的筹备。由于它工程浩大，耗资巨大，因而也必将使明代各个财政机关牵涉其中，为其服务。通过皇家工程的财物筹集事宜可以反映明代国家财政状况及其运行，可以反映皇家营建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程度。

皇家营建的运行和管理是在一定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这种指导思想是明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因而它又是了解明代社会思想及其变迁的一个突破口。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工作在本体论上阐释以往研究中未被充分重视的明代皇家营建的运行和管理。通过这一问题的阐释，将有助于了解明代社会政治、财政经济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状况及其演变，从而加深对明代历史及其变迁的认识。

第二节 研究现状

正是意识到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大价值，学术前辈和同仁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得明代皇家营建的研究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现将二十世纪以来关于明代皇家营建的学术研究状况作如下回顾。

王朝建都地址是影响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是我国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探讨明代建都选址和定都

过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定谟在《地理杂志》1916年第3期上发表了《北京建都考》;华佗在《禹贡》1935年第11期上发表了《明代定都南北两京的经过》;吴晗在《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4期上发表了《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吴士明在1958年4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明初建都问题》;卢秀菊在《史绎》1967年第4期上发表了《明代南北两京建置之经过》;陈致宽在1981年10月28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明成祖定都北京》;万明在《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发表了《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以上研究成果使明代都城的选址过程和两京制度的形成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结论。

在理论方面探讨都城选址原则和应具备的条件的文章主要有谭其骧在1989年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史念海的《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1986年)和侯甬坚的《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81页)。以上论文探讨了适合建都的城市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建都选址的普遍原则,对分析明代都城选址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建筑物本身进行研究是明代皇家营建研究的主体部分,较有影响力的论著如下:以明代宫殿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主要有葛定华的《金陵明故宫图考》(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1933年);朱偕的《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风子的《金陵明故宫考》(《北京晨报·艺圃》,1936年10月6日、7日、9日、12日);朱沛莲的《六百年古都金陵》(《中央日报》,1965年7月19日);李洵的《公元十六七世纪的北京城市结构》(《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阎崇年的《燕京宫苑的民族特性》(《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万依、杨辛的《故宫:东方建筑的瑰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剑英的《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王璞子的《燕王府与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单

士元的《故宫史话》(中华书局,1962年)和《北京明清故宫的蓝图》(科技史文集第5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茹竞华的《紫禁城的总体规划——兼谈古代宫殿建筑的继承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雷从云、陈绍棣、林秀贞的《中国宫殿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徐苹芳的《明北京城复原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其中,王剑英的《明中都》共八部分,近二十一万字,对明中都的历史沿革、设计规划、建筑变迁、对凤阳人民的影响等问题深入细致的进行了考察,史料丰富,论证有力,代表了中都研究的水平。单士元的《故宫史话》是集七十多年的功力完成的一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学术作品。该书不仅阐述了故宫的历史沿革、建筑规制与相关史料,而其对营建过程也有翔实的介绍,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雷从云、陈绍棣、林秀贞的《中国宫殿史》一书1995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2008年修订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九章专辟明代宫殿一章,介绍了明南京、中都、北京的宫殿以及后苑和西苑建筑,可作为综合性资料参考。万依、杨辛的《故宫:东方建筑的瑰宝》全书将美学原理与建筑知识融为一体,分析了故宫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产品,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象征封建帝王权力等方面的特点;对劳动者在这种美的创造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给予了评价;并且比较具体地分析了故宫建筑在形式美方面的特色;以及故宫作为物质产品所体现出来的美学价值。徐苹芳的《明北京城复原图》,以《清乾隆北京城图》为底图,用现代科学方法,将多方面搜寻的明代北京城垣宫殿、坛庙园囿、坊巷胡同等地名,一一填入,在明代北京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前辈论著侧重于明代都城和宫殿皇家建筑营建过程与管理的有:非繁的《北京外城创建考略》(《北京晨报·艺圃》,1935年11月13日、15日);单士元的《明代营建史料》(1933年3月至1935年3月陆续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1—2期及第5卷第1—3期;)单士元、王

壁文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偁的《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侯锬的《明成祖永乐时期改修北京的史实如何？》（《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欧培志的《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雷大受的《“庚戌之变”与北京外城的修建》（《北京史苑》，1982年第1期）；贺树德的《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于倬云的《紫禁城始建经略与明代建筑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3期）；姜舜源的《论北京元明清三朝宫殿的继承和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王剑英、王红的《论从元大都到明北京的演变和发展》（《燕京学报》，1995年新1期）；吴梦麟、刘精义的《房山大石窝与北京明代宫殿陵寝采石——兼谈北京历朝营建用石》（首届明代帝王陵寝研讨会暨首届居庸关长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高寿仙的《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李燮平的《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其中，高寿仙的《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从营建管理、经费筹措、物料采办、匠役征用等方面论述了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具有开创意义，对以后此类研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李燮平的《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考证了元明之际北京营建的历史沿革，根据明清官修史书的记载，考证了北京都城、皇城的城垣变化和紫禁城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考证了元明之际北京历经大都、北平府、行在和升为京师的迁都与营建过程。揭示宫廷建筑规划中的有关问题，以及太和殿在明代三次重建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本书勘比文献，见识独到，考索绵密，有所创见。

明代帝陵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王焕镛先后在《国风半月刊》第1卷第6、8期及第2卷第3期发表了《明孝陵志》；1933年6月，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发表了《明长陵》。随着定陵的发掘，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

先后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和《考古》1959年第7期发表了《定陵试掘简报》，并发表了专著《地下宫殿定陵》（文物出版社，1958年），郑振铎也在1958年3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岳南、杨仕出版了《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小隐在1982年1月的《春秋》上发表了《明孝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出版了《定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三十六号）》（文物出版社，1990年），分上下两册，上册共六章，叙述了“十三陵概况、出土器物等，下册收彩版136、图版391；魏玉清发表了《营建长陵与迁都北京》（《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1997年9月）；胡汉生出版了《明十三陵大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何宝善、韩启华、何涤尘出版了《明神宗与明定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晏子友出版了《明清帝王及其陵寝》（台海出版社，1998年）；李世源发表了《明祖陵营造时间考》（《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胡汉生发表了《明定陵玄宫制度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胡汉生出版了《明十三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和《明代帝陵风水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刘毅出版了《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其中，杨仕、岳南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全书三十三万字，用报告文学的体裁，生动详细地讲述了定陵发掘及有关史实。胡汉生的《明十三陵》通过实地测绘勘察，旁征博引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就明十三陵营建的历史背景、建造过程、陵寝规制、礼制风俗、维修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论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明代帝陵风水说》在介绍我国古代风水理论和它的起源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明代帝陵的选址和风水布局，并对风水文化做出了中肯的评价。该书是迄今为止对明代帝陵风水研究最全面和深入的著作。

明代藩王建筑研究近年来比较兴盛，有一大批论文成果。如何光岳的《长沙明藩王府考》（《湖南日报》，1980年7月24日）；许智范的《藩

王贪财势随葬夸豪富——介绍江西的几座明代藩王墓》（《南方文物》，1982年第4期）；霍巍的《论江西明代后期藩王墓葬的形制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苏晋予的《河南藩府甲天下——明代河南藩王述论之一》（《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若亚的《明代诸王府规制述略》（《明史研究》，黄山书社，1993年第3期）；金来恩、田娟的《明朝赣地藩王及其墓葬》（《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卢升弟的《明代蜀王的地下宫殿》，（《成都日报》，2006年12月18日）；肖健一的《明秦藩家族谱系及墓葬分布初探》（《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以上论文或以整个明代藩王，或以某一藩王族系，或以某一地区藩王为研究对象，均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明代宗教建筑研究方面，佛教建筑研究应首推南开大学的何孝荣先生。他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详细阐述了明代南京佛寺的兴盛原因、兴废和分布状况、各类建筑的配置、僧人的来源和等级结构、经济部门和财政收支、管理制度和佛事活动、对国家和民众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他的《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认为：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二百一十所，总数起码有三百所，最多可以超过六百所。2007年，何孝荣又出版了《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内容包括：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明代建都北京与北京的发展，明代帝王、后妃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等，并归纳总结了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和原因。“这部书是名副其实

的填补学术空白之作。”陶金的《明朝内府廿四衙门与皇城内的真武庙》（《中国道教》，2007年第2期）指出明朝初年对宦官与寺庙都有着极其严格的控制，然而它们在明朝末年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北京皇城内的真武庙便是最好的例证。

以上是对20世纪以来涉及明代皇家建筑营建研究成果的粗略回顾，未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是仅就以上所列可以看出以往这方面学术成果之丰富之精到。它们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独特的研究范式以及令人信服的观点，这一切都是后来者继续学术研究的基石。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往对皇家建筑所作的学术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对象总体上侧重于某个建筑物或建筑群的研究；

二是研究内容多为单一地介绍某个建筑物或建筑群的规模规制、历史沿革、设计布局、建筑特色、艺术风格等；

三是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建筑物本身，而不很注重建筑物营建过程及其管理。

基于以上研究状况，笔者在导师毛佩琦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和管理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视野上突破以往研究中仅谈某个建筑物或建筑群的局限，而是以皇家营建为整体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着重于对营建过程包括卜选地址、拟定规制、筹集和管理营建所需的人财物以及施工过程等等问题的探究。在研究目的方面，笔者主要希望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和管理，并希望通过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和管理的研究加深对明代政治、经济、思想状况的认识。

第三节 本书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一、本书思路 and 主要内容

本书着重阐述明代皇家建筑的兴建动因，皇家营建卜选地址的过程

和管理,拟定规制的过程和管理,营建经费的筹集和管理,营建物料的采运和管理,营建人员的召集、组织、管理和具体施工过程的管理等问题。由于以上问题在逻辑时间上具有前后相继的特点,所以本书采取先阐述营建皇家建筑的动因,然后论述选址、拟制和营建所需的人财物的筹集等营建准备阶段的诸多问题。最后对具体施工过程从破土兴工到施工过程直至完工后的核查和赏罚做力所能及的探究。因此本书除绪论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介绍明代皇家建筑的分类和皇家建筑的兴建缘由,目的在于探究皇家营建活动的目的。皇家建筑根据其用途可分为殿宇苑囿类、陵墓类和祭祀类三大类;由于皇家建筑具有建筑物的实用性、礼制象征性以及政治教化性等特性,还可依据皇家建筑某种特性在建筑物中体现的突出程度将其分作实用类建筑、礼制象征类建筑和政治教化类建筑三大类。修建这些建筑具有实用、享乐、祈福和教化等目的,而所有这一切营建活动,排除个别皇帝为了一己私欲,追求享乐,肆意营建外,其终极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第二章主要探讨明代皇家营建的选址问题,包括都城和宫殿选址、帝陵选址、宗室建筑选址和其他皇家建筑的选址等几部分内容。明代都城和宫殿选址先后经历了南京、大梁、临濠、关中和北京几处。以上选址过程中,社会人文条件是主要考虑因素。皇帝陵寝一般选在都城附近。皇帝通常会派礼部、钦天监、工部官员、具有地理风水专长的官员和征召而至的风水术士前往陵区选址。整个明朝的帝陵选址呈现出选址人员的规格越来越高,选址队伍越来越庞大的趋势,皇帝生前预建寿宫的情况尤其如此,反映出皇帝对帝陵选址的重视程度。选址人员会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治、风水、礼法和施工因素卜选认为合宜的选址地,然后绘图贴说上奏皇帝定夺,如果皇帝和大臣们有异议则再行勘选。

王府营建选址,明初主要是从政治军事上考虑,藩王多分封在边疆

或内地重镇。靖难之役后则侧重于考虑自然和经济条件。明朝前期，各藩王之国后的王府宫殿大都承袭当地原有建筑。就分封的区域而言，各地均有藩王封地，而河南最多。王府选址一般由皇帝钦定后就不再更改。但明代存在着大量宗室奏请营建、改迁王府和墓葬的事例。明初改迁多出于政治原因，自永乐以后加强了对藩王的限制，因政治原因改迁的事例减少。此后宗室要求改迁多以封地自然、经济条件恶劣或地缘人际关系紧张为由。皇帝多会依据祖制和实际情况给以裁决。

明代的社坛、郊庙的选址主要根据《周礼》的规定和汉唐宋的先例，结合明朝自身的情况确立。这样做既表明自己是封建正统王朝的继承者，又能适应现实需要，不拘泥于旧制。历代帝王、先贤、功臣和当朝文武功臣祠庙多建在其故里、主要事迹地。对于某些具有显赫功绩和对统治具有特殊作用的人物，为显示尊崇也在京城修造其相关建筑。

第三章主要探讨明代皇家营建的规制拟定问题。明代皇家营建在拟定规制时一般会综合考虑实用、礼制、经费、地理风水和审美等因素。其中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礼制，然后是经费，最后是美观方面的要求。

从明代三都的营建过程和宫殿实际规制来看，南京、中都和北京宫殿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前后相继，规制上前后因袭，呈现出营建规模规制趋于繁复的特征。

明代帝陵营建规制的拟定是皇帝主导的，以礼、工二部官员为主要力量，有其他部门以及风水术士等人员广泛参与的活动。拟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皇帝亲自拟定；更为常见的方式是由礼部负责组织工部官员、内阁辅臣、风水术士等人员参与拟定。拟制人员在充分了解礼制、地理风水等方面情况后绘制营建规制图纸上奏皇帝裁夺。如果对营建规制有意见分歧的话，就要重新拟定，上请裁定，直到皇帝满意为止。总体来看，拟定规制所用时间不长。

宗室营建规制的制定在废宰相之前，一般由皇帝给中书省下令，中书省令礼部或工部官员拟制，最后由皇帝裁定。废除宰相制度之后，礼部或工部就直上承皇帝旨意来拟定宗室建筑的規制。他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向皇帝提出拟制请求。宗室自请营建规制的事例也大量存在。其程序一般是由总管王府事务的长史司写好请求内容，报送本府的亲王，然后上报礼部、工部或宗人府，他们将请求内容上达皇帝，皇帝批准后才能实施。虽然明朝对宗室建筑的規制做出了详尽的规定，皇帝对于宗室的营建请求也多以既定規制为依据来答复，但是总体来看，执行情况不佳。

第四章主要探讨明代皇家营建经费的来源、筹集和管理问题。明代皇家营建的经费可分为常规来源、挪借来源、应急来源等。就整个明代来看，王朝前期皇家营建经费主要仰仗常规来源，明朝中后期挪借来源、应急来源成为皇家营建经费筹集的普遍现象。

皇家营建项目确定后，内府营建项目的经费估算多由内官会同科道官和工部官共同确定营建费用。而实际上，其费用由内官监确定，工部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内官监报出的高于实际费用至少数倍的基础上削减三分之一供给，这导致了预算额度虚高。京外的宗室建筑、宗教建筑和历代帝王、先贤、功臣祠庙的经费预算则主要由工部完成。地方宗室营建经费由明初国家完全负责，到成化时改为给价自造，又到减半支給，以至最终变为非帝孙、王孙，非初封者完全失去了来自朝廷营建经费的支持。

皇家营建经费预算额度的确定过程大体是负责官员将预算费用上报，皇帝酌情批复。预估经费并不是最终的营建经费。许多大型营建项目的经费不易确定，于是会先确定一部分先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根据需要，随着建造进度不断增补经费。所以前期的估算不过是一种大体的预算，皇帝也不会完全拘泥于起初的估算，建造出令人满意的建筑才是最终目的。

营建经费额度确定后，皇帝会将经费指派到各部门、机构，并要求